

狐狸之夜

〔美〕杰克·希金斯 著

颜岭梅

黄昕

吴模信

译

校

L'image

pro

par

de

la

France

et

de

la

France

et

de

la

France

et

de

la

France

et

de

la

France

et

de

la

France



狐狸之夜

〔美〕杰克·希金斯 著

颜岭梅 黄昕 译

吴模信 校

FOX

S

责任编辑 裴善明

装帧设计 牛 昕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04号

Jack Higgins

NIGHT OF THE FOX

根据美国SIMON AND SCHUSTER 1986年版译出

狐狸之夜

[英] 杰克·希金斯 著 颜岭梅 黄昕 译

责任编辑: 裴善明

出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283号) 邮政编码: 230063

发行: 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 安徽省宣城地委印刷厂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9.75

插页: 2

字数: 210,000

版次: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5300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0254-6/I·224

定价: 3.9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叙述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，其中还涉及到一个据说保密期为一百年的机密。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一九四四年，盟军即将在诺曼底登陆，向欧州的德军占领区发起总反攻。就在此时，盟军的一位了解反攻计划的上校，在登陆演习中落水失踪。如果这位上校落到德国人手中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盟军最高统帅部得到情报说，这位上校受伤被海浪冲到了德军占领的泽西岛。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派人或将此人营救出来，或让他永远沉默。

有着德国血统的美国特工人员马蒂诺，受命装扮成一名盖世太保，携一位年轻姑娘扮成他的法国情妇，潜入泽西岛。就在他们将要实施营救计划的时候，人称“沙漠之狐”的德军元帅隆美尔来到泽西岛视察军情。马蒂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！营救计划受到威胁！诺曼底战役受到威胁……

本书作者是一位英国人，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擅长写战争题材的小说。本书不仅内容逼真，而且情节曲折惊险，在紧张的气氛中，不时给人以峰迴路转，出奇制胜之感。

1

古罗马基督教认为，死者的灵魂会在他们的墓旁徘徊不去。三月的早晨，天气阴冷而黑沉沉的，犹如夜幕降临。

我伫立在花岗石拱廊里，向墓地望去。路边的木牌上写着：圣布里勒德教区教堂。这个地方遍地都是墓石、墓碑和花岗石十字架。远处的一个墓碑上，有一尊展翅飞翔的天使雕像。我正站在那里出神，顷刻，雷声大作，海湾下起了大雨。

旅馆的门卫给了我一把雨伞。我撑开伞，壮着胆子走进了墓地。星期天，我在波士顿，当时我从未听说过离法国海岸不远还有不列颠海峡群岛，或者说泽西岛。现在是星期四，仅仅几天，我已经游历了大半这个世界。在这里，我要解开我花了三年时间一直未能解开的一个谜。

教堂是一幢式样古老的建筑物，全是用花岗石造的。我走过墓地，向教堂走去，间或停下来向海湾眺望一眼。此时已经退潮了，金色的沙滩被潮水冲刷得光洁如镜，连绵不断一直延伸到防波堤。我清楚地看见我住的那个旅馆。

背后传来声音。我回过头去，只见墙那边的柏树下蹲着两个头戴布帽，肩上挂着麻袋的人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站了起来，嘻笑着远去了，仿佛他们在开心地逗趣。这时，我才注

意到他们还带着铲子。等他们消失在教堂后面我才向墙边走去。

这里有一个新挖的墓坑，尽管旁边的柏树枝叶使墓坑多多少少免受了一场雨淋，可上面仍然覆盖着防水雨布。此刻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眼前的一切就象是特地为我安排的一样。我转身穿过墓石，来到教堂门口，推门走了进去。

在我的想象当中，教堂这样的地方一定是个阴暗而又令人感到忧郁恐慌的地方。然而我全错了，这里灯火通明，一派异常壮观的景象。拱形的天花板也是用花岗石建造的，看不到一根木制的横梁。我走近圣坛，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环顾四周，蓦然才意识到这里的肃静。门“卡嗒”一声开了，又被人关了。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

他满头苍苍白发，淡蓝色的眼睛，身穿一件黑色长袍，一只手臂上挂着雨衣。他的声音干涩，一副老人腔，带着一点儿爱尔兰土音：“我能帮你什么忙吗？”

“你是教区长？”

“哦，不。”他温和地笑着说，“他们早就不让我干了。我叫卡伦，卡农·唐纳德·卡伦。你是美国人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同他握了手，“阿兰·斯特西。”想不到他有一双虎钳般的手，把我的手握得生疼。

“你第一次到泽西来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“几天前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。就象大多数美国人一样，我只听说过新泽西。”

他笑了。我们向教堂门口走去。他继续说：“你第一次来泽西就选了这么一个倒霉的季节。世界上有许多令人向往的地方，泽西也算得上是其中之一，可三月份这段时间是例

外。”

“我没有更多的选择，”我说。“你们今天在这里是为某个人举行葬礼吧！为哈里·马蒂诺。”

他拉了拉雨衣，听了我的话，在惊奇中停顿了一下。

“是的，事实上是由我主持葬礼，今天下午两点。你是他的亲戚？”

“不完全是，尽管有时我仿佛感到是他的亲戚。我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副教授，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我一直在写一部关于马蒂诺的传记。”

“是这样。”他打开门，我们走出房间，到了走廊上。

“你很了解他？”我问。

“不怎么了解，除了他在自己的生命结束时所用的那种离奇的方式之外。”

“还有为他举行最后仪式的那种更加奇特的环境，”我说。“卡伦，一个人死后四十年，才为他举行葬礼，这对于你来说毕竟不是一件常有的事吧。”

在圣布里勒德海湾的另一端，紧挨着我住的地平线旅馆，有一幢平房。它小巧而简陋，可它的起居室却十分宽敞舒适。房间的东西杂乱无章，两边的墙根一溜顺地堆放着书籍。滑动拉窗与露台相通。外面是一个小花园。远处是海湾。潮汐又上来了。海风把海水撕成白帽浪。雨水打在窗户上嗒嗒作响。

我的主人从厨房里出来，在火炉边的小桌子上放了一只托盘。“来点茶，可以吗？”

“茶当然不错。”

“我们家里只有我老伴喜欢喝咖啡，她在三年前去世了。我从来不能容忍喝那玩艺儿。”

我在桌子的另一方坐下来。他在杯子里倒满了茶，推到我眼前。我们彼此都保持着沉默，他端起茶杯机械地喝着茶，等待着我说话。

“你住在这里感到很不错？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，”他说，“我确实感到不错，当然也很孤独。斯特西教授，人类最大的弱点就是不甘孤寂。”他往自己杯子里倒着茶，“我当孩子的时候在泽西住过三年，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。”

“那真够安逸的。”我向海湾望去，“这里很美。”

“我曾多次回到这里来度假。我退休时，是温彻斯特大教堂牧师会成员。我们唯一的儿子前几年移居去了澳大利亚……”他耸了耸肩。“这平房是我老伴从她叔叔那里得来的遗产，这房子归她已经有许多年了，我们只能选择泽西这个地方定居。”

“那一定很合适。”

“是的，尤其根据他们这里的房产法的规定。”他放下杯子，拿出烟斗，从一个破旧的皮制烟草袋里掏出些烟丝来装在烟斗里。“所以，”他爽快地说，“你现在对我的一切都知道了，那么你呢？还有你的朋友马蒂诺？”

“你听说过他吗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。直到前几天我的朋友德雷顿博士来看我，才告诉我马蒂诺的遗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发现的，还说遗体正从伦敦运送到泽西来安葬。”

“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一九四五年的一次飞机失事。”

“确切地说，是一九四五年一月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英国皇家空军有一支部队叫敌机战斗队。他们驾驶的飞机全都是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，主要进行一些飞机性能的测试飞行等等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哈里·马蒂诺曾在经济战部工作。一九四五年一月，他作为观察员乘坐阿拉多—96飞机，在飞行时失踪了。大家都一直以为飞机肯定堕入海里了。阿拉多—96飞机是由敌机战斗队驾驶的德国双人座训练机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两个星期前，在埃塞克斯沼泽挖掘工区发现了这架飞机。当英国皇家空军部队意识到他们发现了什么时，便立即停止了工地的一切工作。”

“马蒂诺和那飞机驾驶员还在里面？”

“他们留下了些什么，出于某些原因，官方在这件事上含糊其词，不敢开诚布公。直到上个礼拜的周末，我还没有得到与这有关的消息。我是乘头班飞机在星期一早晨到达伦敦的。”

他点点头，“你说你在写马蒂诺的传记。他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？我说过了，我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。”

“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他。”我说，“可是在三十年代，在学术界……，”我耸耸肩。“伯特兰·罗素认为马蒂诺是他那个领域里最卓越，最富有创见的学者之一。”

“什么领域？”

“道德哲学。”

“真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领域，”卡伦说。

“他是个有魄力的人，出生在波士顿，父亲是个航运商，很富有，可并不残暴蛮横。他的母亲出生在纽约，是个德国后裔。她父亲在哥伦比亚教了几年书，一九二五年回到德国，在德累斯顿大学担任外科学教授。”我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，凝视着窗外。“马蒂诺后来去了哈佛；又在海德尔堡攻读了博士，三十八岁时成了牛津大学的罗兹奖金领受者，三一学院的评议员和道德哲学的克罗克斯利讲座教授。”

“真是成就卓著，”卡伦说。

我回过头来，“可你不明白，这是个对一切都抱怀疑态度的人，他把他的那个领域全部推翻了重来。后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他从此销声匿迹了。他的故事再也没有下文，直到现在也没有。”

“他销声匿迹了？”

“哦，我们知道他后来离开了牛津，在国防部和经济战部工作过，这我已经告诉过你。许多学者都这样做。他似乎完全停止了他所选择的那个领域的一切学术研究。这是他的悲剧。他再也没有发表过论文，他一直在写的一本专著也没有完成。我们在哈佛找到了他的手稿。一九三九年九月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写过一行字。”

“真奇怪。”

我走回桌子旁，坐了下来，“哈佛大学图书馆有他所有的论文，使我有兴趣来研究它们是一件我个人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使你对这一切感兴趣？”

“我高中毕业时十八岁，本来应该上哈佛大学，可我参

加了海军，在越南服役了一年。后来因左膝盖骨被子弹打中，不得不解甲归田。马蒂诺跟我差不多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加入了美国远征部队，那时他还不到法定的服兵役年龄，是佛兰德步兵部队的一名二等兵。我们的经历常常使我对这个事实迷惑不解：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找到了不同的答案。”

“从战争的地狱到冷静的灵魂深处。”卡农·卡伦在炉边磕打着他的烟斗，“我记不得这是谁说的话，大概是战争年代的诗人或是别的什么人。”

“上帝把我从那些灾难中拯救了出来，”我说，“越南佬使我永远失去了左腿，我在精神病医生手里挣扎了三年，婚姻也因此告吹了。”

壁炉上的钟敲了十二下。卡伦起身走到餐具柜前，从一个雕花玻璃水瓶里倒了两杯威士忌。他端了一杯给我，“战争时期，我住在缅甸。那地方糟透了。”他呷了一小口威士忌，把杯子放在炉边，“那么，教授，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？”

“教士们应该是单纯的，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。”他的声音沙哑而刻板。“当然，这是废话，我们的职责是忏悔，是关心人类的痛苦和灾难。教授，我作为一个当了五十年的委任牧师，是了解人们的。当他们没有把一切告诉你的时候，你应该学会去了解这一切。”他划了根火柴点燃了烟。他喷了一口烟雾，“我说的这些话用到你这里最合适，我的朋友，除非我被误解了。”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：“马蒂诺被发现时穿着军装。”

卡伦皱着眉头：“可你说过他在经济战部工作。”

“他穿着德国空军制服，还有那驾驶员。”我说。

“你能肯定？”

“我在越南当兵时认识一个叫托尼·比安科的朋友，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，现派往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工作。他们这些人对这种事了如指掌。我曾带着一些问题走访过国防部，关于马蒂诺和那架飞机的事，他们只字不提。”

“你的朋友为你核实过这事吗？”

“我还发现了别的情况。纸报报道了敌机战斗队的阿拉多飞机，那也是不可信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总是重复英国皇家空军的老调。根据毕安科提供的信息，这架飞机仍然还有德国空军的标记。”

“你不是说你从官方搞不到任何消息吗？”

“我是搞不到。尽管这似乎很可笑，可是马蒂诺和这架飞机的情况仍然被当成战时保安机密被封锁起来。”

老人皱了皱眉，“四十年还这样？”

“还有哩，”我说。“去年我在搞这项研究工作时，遇到过类似的问题，使我陷入了困境。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。我发现，马蒂诺在一九四四年一月被授予功勋奖章，但从未有任何文件对这种功勋奖章的含义作过解释。我根本无从知道马蒂诺究竟做了些什么，以致于他能获得这种荣誉。”

“那是一种军事奖，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，可马蒂诺并不是一名军职人员。”

“显然他只是某些罕见场合的文职人员。三年前，我在牛津大学搞研究时，听到一段故事。马克斯·库比尔是牛津大学原子核物理教授，和马蒂诺是朋友。”

“我听说过他。”卡伦说，“他是德国犹太人，不是吗？他在纳粹分子送他进集中营之前曾设法逃跑？”

“他在一九七三年去世了，”我说。“我设法和那个在牛津大学服侍他三十年的老仆人谈过。他告诉我，一九四〇年德国大举进攻导致了敦刻尔克撤退，库比尔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盖世太保从他的佛赖堡住宅里抓走的。他们刚从法国穿过德国边界时，来了一个党卫队军官，他带领一队卫兵把库比尔带走，送到了柏林。”

“是这样？”

“这个老仆人名叫霍华德。他说库比尔在几年前告诉他，那个党卫队军官就是马蒂诺。”

“你相信他？”

“当时并不相信。他九十一岁了，有点痴呆。可你不要忘了马蒂诺的背景，很明显，任何时候，他都被认为是德国人。他不仅会讲德语，而且还有一个德国的家庭作为背景。”

卡伦点点头，“这么说，你是准备证实这个故事是令人可信的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耸耸肩。“这说明不了什么。譬如，马蒂诺和泽西。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，马蒂诺从来没有到过泽西。他在纳粹分子从泽西撤走前五个月就死了。”我喝干了杯子里的威士忌。“马蒂诺没有亲戚，我知道他没有结过婚。那么，你说的那个德雷顿博士是谁？有件事我是知道的。这个德雷顿博士跟英国国防部一定有什么瓜葛，不然怎能使他们同意把马蒂诺的遗体让他去安葬？”

“你完全说对了。”卡伦又给我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，

“真令人满意，除了一点以外。”

“哪一点？”

“德雷顿博士，”他说，“不是他，而是她，说得确切些，萨拉·德雷顿博士。”他举起杯子为我干杯。

“我是复活使者与生命。上帝说：相信我的人，将虽死犹生。”

卡伦在大雨中用力地吊起嗓门，使他那爱尔兰土腔显得更加浓厚。他的祭服外面罩着一件颜色黯淡的斗篷。有个来参加葬礼的人站在他身旁，为他打着雨伞。这里只有一个送葬者——萨拉·德雷顿。她站在墓坑的另一端，由丧葬承办人为她打着雨伞。

她看上去大约四十八岁或五十岁，后来我才发现她有六十岁了。她的身段小巧瘦弱，穿着一套黑色的带有帽子的两件头女式普通西服，显得很整洁。烫过的灰白色短发，梳理得很考究。按照普通人的标准，她一点儿也不漂亮，嘴巴太大，宽阔的颧骨上方是一双淡褐色的眼睛。她的外貌给人的印象仿佛她是一个历尽生活欢乐与坎坷的人。她非常平静。如果我在大街上与她擦肩而过，我会身不由己地回过头来再看她一眼。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人。

她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。我站在后面大树下能遮雨的地方。我虽然有雨伞，可还是被大雨浇得象落汤鸡似的。此时，卡伦已结束了葬礼仪式，他走到萨拉跟前，简单地跟她说了两句话。她在他的脸颊上吻了一下。他转身向教堂走去，后面跟着那些承办丧事的人。

她在墓边站了一会儿。两个掘墓人站在离她几码远的地

方恭候着。我走近她身边，她仍然没有察觉。我抓起一小把湿土撒在棺木上。

“德雷顿博士？”我说，“很抱歉打扰您了。我叫阿兰·斯特西。我不知道能否跟您讲两句话？顺便说一下，我不是记者。”

她的声音比我所预料的还要低，平静而顿挫有致。她没有看我，说：“我知道你是谁，斯特西教授。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我时时刻刻都盼望着你的到来。”她回过头来，微笑着，她在顷刻之间变得迷人起来，仿佛只有二十岁。“我们不应该站在这雨里说话，会生病的。我的车停在外面的路旁，我想你最好去我家喝点什么。”

她住的地方离这儿只有五分钟的路程。她熟练地驾驶着汽车方向盘，风驰电掣般地在狭窄的乡间小道上奔驰。车子在一个精心修整过的花园边停了下来。花园四周环绕着山毛榉树。透过树林，可以看见远处的海湾。那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别墅，窄长的窗户，前面有绿色的百叶窗板，进门的地方有门廊。我们走上台阶，一个个子高高、面色忧郁的男人马上过来把门打开。他一头银发，穿着一件黑色的羊驼毛织的茄克衫，戴着一副合金边眼镜。

“哦，维托，”她说，老人帮她脱下外衣，“这是斯特西教授。”

“教授。”他微微地鞠了一个躬。

“你等会儿把咖啡送到书房来，”她说，“别的事我来照料。”

“当然，康特莎。”

他转身走开，停了一会儿，他用蹩大利语跟她说话。她摇摇头，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回答他。他穿过大厅后面的门走了。

“康特莎？”我问。

“啊，别听维托的，”她很有礼貌地打消了我的疑虑，口气平稳，“他是个势利眼，就这个样儿。”

大厅里很寒冷，但却令人感到清爽适意。地面上铺着黑白瓷砖。楼梯从大厅弯曲延伸上去，墙上挂着两三幅油画，是十八世纪的海景画。她打开一扇双料的红木门，带我走进了一间宽敞的书房。书籍靠墙放着。从法式窗户往外望，可以看见花园。旧式的壁炉边围着象篮子一样的炉栅，里面旺旺地燃着一堆火。房里还有一架豪华式大钢琴，上面摆满了照片，多数照片都装在银质镜框里。

“你来点苏格兰威士忌好吗？”她问。

“很好。”

她走到酒橱前，不亦乐乎地忙了一阵。“我是谁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问。“是卡伦告诉你的？”

“你刚动手研究哈里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了。”她递给我一杯威士忌。
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哦，朋友，”她说，“过去的朋友，一个知道内幕的头面人物。”

她的话使我想起了托尼·毕安科，想起了我与大使馆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接触。我立刻愤懑起来。“国防部里好象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的任何问题。”

“我料想他们不会回答您的问题。”

“可他们把马蒂诺的遗体给你，让你安葬，你肯定对他们施加了什么压力。”

“你可以这么说。”她从一个银盆子里拿出一支香烟点上，坐在炉边的靠头高背椅上，交叉着细小的双腿。“您听说过特别行动计划委员会吧，教授？”

“当然听说过，那是一九四〇年英国情报部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建立起来的，主要协调欧洲的地下运动和抵抗运动。”

“‘点燃欧洲之火’，这是那老头子的命令。”萨拉·德雷顿把烟灰弹进火炉里。“我为他们工作过。”

我十分吃惊：“可那时你还是个孩子。”

“十九岁，”她说，“一九四四年时十九岁。”

“还有马蒂诺？”

“瞧那钢琴上，”她说，“边上那张装在银镜框里的照片。”

我走到钢琴旁，拿起那张照片。她的面容跃入我的眼帘。真不可思议，以前的她跟现在的她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是头发有些不同。她的头发烫成波浪形，是亚麻色的。她戴着一顶小黑帽，穿着一件战时很时兴的外衣，嵌有宽大的垫肩，腰间收得很紧，脚上穿着长筒袜，高跟鞋，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的漆皮提包。

挨在她旁边站着的男人是个中等个头，花呢制服外面套着一件军用雨衣。他双手插在口袋里。深色的阔边软呢帽投下的阴影遮住了他面部的一角。他嘴角叼着香烟，那双黑幽幽的眼睛没法用语言来形容。他的笑容里带着一种冷峻残酷的魅力，看上去令人生畏。